

《乌鸦巫师》与“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时代的非洲革命及伦理问题

African Revolution and its Ethics in *Wizard of the Crow* as Seen in an Era of “Capitalist Fundamentalism”

姚 峰 (Yao Feng)

内容摘要：小说《乌鸦巫师》在恩古吉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恩古吉刻画了众多从属不同阵营的人物在革命运动中的不同选择，隐含了他对革命伦理的思考。另一方面，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潮流中，《乌鸦巫师》提出了非洲革命的别调。恩古吉在此提示了抵抗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重新提出以“第三世界”这种另类世界性思想资源，反抗西方金融霸权对非洲的再殖民化，这种崭新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互动方式即恩古吉抵抗策略的特征。

关键词：恩古吉；《乌鸦巫师》；非洲革命；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第三世界

作者简介：姚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与思想。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齐努阿·阿契贝：非洲小民族作家的解域实践”【项目批号：19FWWB0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批号：19ZDA296】及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Title: African Revolution and its Ethics in *Wizard of the Crow* as Seen in an Era of “Capitalist Fundamentalism”

Abstract: *Wizard of the Crow*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Ngugi's fictional works. On the one hand, Ngugi portrays many character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camps, who make different choices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implying Ngugi's thoughts on the ethics of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Ngugi propos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African revolu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neoliberal trend. Ngugi reminds of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resistance. “The Third World” is presented as alternative cosmopolitan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o redress the recolonization of Africa under the exertion of Western financial hegemony. Therefore, this unprecedented mod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Ngugi's strategy of resistance.

Keywords: Ngugi; *Wizard of the Crow*; African revolution; capitalist fundamentalism;

the Third World

Author: Yao F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China) and a member of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team on “The Diversity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ransfer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Shanghai.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f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mail: yaofeng1975@shnu.edu.cn).

《乌鸦巫师》（*Wizard of the Crow*，下文简称《巫师》）基库尤语版本完稿于2002年，是长期流亡海外的恩古吉献给肯尼亚同胞的赠礼，其中不乏对不同群体在肯尼亚后殖民政治斗争中所作不同选择的探讨。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巫师》作为讽喻性政治寓言，通过刻画以妮亚维拉（Nyawĩra）和独裁者（Ruler）为代表的两个知识精英群体的伦理选择，对“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时代的非洲革命伦理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与探讨。肯尼亚知识分子威利·穆通加（Willy Mutunga）准确指认了《巫师》的两大构成要素，即对独裁统治的“去魅”与“抵抗”。不过，此作展开的抵抗叙事与恩古吉以往作品有所不同。¹美国学者伊恩·麦克唐纳（Ian P. MacDonald）曾明言《巫师》与恩古吉之前作品区别在于“从民族主义走向了全球范围，从而拓宽了早先对于抵抗较狭隘的再现”（MacDonald and Ian 59）²。自《巫师》始，恩古吉的论述视角从民族转向世界。应该说，非洲现代文学与外来殖民主义密不可分，民族性与世界性天然地彼此交织。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此作涉及大量当代全球性力量就否定其民族性，或认为此前作品就拘泥于地方一隅。本文认为恩古吉在后冷战时代，通过《巫师》重新提出了反殖反帝革命这一彼时思想潮流中（看似）不合时宜的话题，即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当道的新语境中，如何提出有效的抵抗策略并展开新的抵抗实践。若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统归于“抵抗”主题之下，二者未必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或呈现为彼此借力并相互转化的互动往来。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既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³本文即通过此作重返两个知识精英群体走向不同道路的历史现场，拟在《巫师》呈现的肯尼亚后殖民政治斗争史脉络中，从必要性、可能性与具体策略三方面层层揭开恩古吉布局的抵抗图景及其提出的世界主义新论。

1 参见 Willy Mutunga, “Ngũgĩ wa Thiong’o at 80: Inspiring Encounters,” *Ngũgĩ: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of Writing*, edited by Simon Gikandi and Ndirangu Wachanga, Woodbridge, Suffolk: James Currey, 2018, 69.

2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3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2.

一、革命的必要性：“全球银行”的金融霸权与“独裁者”的买办属性

《巫师》中的美国特使访问非洲阿布拉利亚国（Aburiria，下文简称阿国），敦促该国“与世界步调一致”，以实现“构筑全球秩序的新使命”（Thiong'o 580）¹。恩古吉借人物之口、从西方资本一端点明冷战后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即“所有盘算都受制于全球化的规律与需要”（580）。恩古吉将此新特征归为“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且“惟此一种组织现实的方式”（Thiong'o, *Secure the Base* 23）。小说以全球银行（Global Bank）与全球金融部（Global Ministry of Finance）为喻体，暗指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西方金融霸权对非洲乃至第三世界的深度控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体现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属性。

恩古吉曾预言，20世纪90年代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面对“激进民族解放”与“根本的社会变革”诉求，会进入“最后的疯狂阶段”，而斗争的“剧场”依是第三世界（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53）。恩古吉在《巫师》中次第展开的抵抗未直接指向西方资本或新殖民主义，而主要针对作为西方资本代理人的本土统治集团。《巫师》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独裁者如何依仗白人权势登上“权力巅峰”（231-232）。独裁者既然选择依附殖民者势力登上高位，就表明已在一己私利与人民利益之间做了伦理选择。《巫师》中的独裁者未必对应肯尼亚或非洲现实政治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多个政治人物的“集大成者”，独裁者及其政党独立后在经济与外交上得到了白人殖民者的支持，助其跻身仅次于首任总统的二号人物，这与肯尼亚政治史实大致相符。

整个60年代，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政府声称既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也反对东方共产主义，选择积极的不结盟政策。小说中的独裁者面对美国来使亦持相似论调，称不可能“总是听命于西方”（581）。但事实上，政治精英在独立后竞相寻找域外金援国，为各自政治活动提供资金，故总体采取了亲西方、亲资本的对外政策，导致肯尼亚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增长乏力，陷入了结构性危机，第三世界随之陷入粮食危机、债务危机。对此，非洲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上述70年代的危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即对亚非拉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世纪”（*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115）的终结。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肯尼亚资产阶级，此时甘愿蜕变为西方利益的代理人，迎合西方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法国当代非洲政治观察家让-弗朗索瓦·巴亚特（Jean-François Bayart）认为，非洲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最大特征是“依附”；作为殖民主义的后果，肯尼亚的经济力量取决于发达国家

1 本文有关《乌鸦巫师》的引文均来自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对其进口需求。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发展经济，后殖民政权只能在此依附关系中充当“中间人”（intermediaries），赢得政权就等于控制了私人资本投资、出口收益与援助资金的流入。¹这种由“外向”（extraversion）导致的依附性，是后殖民时代非洲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阿明称之为“买办化臣服”（compradorized subordination），即恩古吉所谓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如非洲）造成的恶果。

恩古吉对阿布拉利亚国当局的买办属性用墨甚多，主要表现于买办政权对西方金融资本的依附。法农强调，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心理层面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认同，其“内核”是“享乐主义的心态”（Fanon 101）。小说中，塔吉里卡（Tajirika）与妻子维吉尼亚（Vinjia）对白人的认同，就表现为法农意义上的晚年“享乐主义”。扮作乌鸦巫师的卡米提（Kamiti）让夫妇二人闭上眼睛想象暮年相伴的画面。此时，塔吉里卡脑中显现的是“殖民者的样子”（186），即曾在阿国“对我们发号施令的那些人”（186）；维吉尼亚又补充说，这些昔日殖民者看上去“是纯粹的白色”（186）；二人臆想自己曾差点成了阿国的总督与第一夫人，回忆起曾拥有的城中大宅与海边别墅，有佣人伺候左右，还想起房前屋后的草坪、绿篱、泳池与车队。按法农的思路分析，非洲买办资产阶级未曾经历西方资产阶级青少年时代的肆无忌惮与生机勃勃，因而《巫师》此处的晚年想象也以文学手法印证了此阶级在思想上的孱弱与依附性。²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在以新殖民主义与美国霸权为两大基本特征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扶植与支持“全世界最反动、最压迫的”（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51）独裁统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如果对外表现为依附性，那么对内的特征必定是压迫性。《巫师》以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地塑造了典型的独裁者形象，以体现上述“压迫性”特征。民族资产阶级在独立后，无力凭借经济手段确保统治，故无力兑现独立运动时期的承诺，国家在独立后逐步陷入经济停滞的困境中，而为了掩盖这样的停滞或倒退、赋予其统治以合法性，资产阶级惟有在首都修筑庞大建筑，把大量资金用于“形象工程”（Fanon 111）。小说中最典型的“形象工程”是贯穿全篇的通天塔（Marching to Heaven）——类似以色列人未能建成的巴比塔。这大致影射了莫伊总统1989年提议在内罗毕的自由公园（Uhuru Park）修建的巨型建筑——科尼亚时代传媒中心（Kenya Times Media Complex）。

独裁者终究只是“一群投机者的CEO”，而民众“痛苦地在无法忍受的贫困中停滞不前”（Fanon 112）。小说中独裁者的阔绰与民众的贫困形成鲜

1 参见 Jean-François Bayart and Stephen Ellis, “Africa in the world: A history of extraversion,” *African Affairs* 2 (2000): 217-267.

2 参见 Ngũgĩ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186-187.

明对比,生日庆典后的一个周日,独裁者前往教堂的豪华车队途径圣玛利亚集市(Santamaria marketplace),与市场中的驴车与人力车之间反差惊人。¹在这些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巨大的财富”与“极度的贫困”(Fanon 117)相伴而生,如同《巫师》中在埃尔达雷斯现代建筑与地产公司外面分别形成的两支队伍——一支是急于从通天塔工程中渔利的投机富商群体,另一支则是嗷嗷待哺的失业贫民群体。恩古吉在《巫师》中,暴露了冷战后金融帝国主义在全球结构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造成的两极化恶果,揭露了非洲资产阶级执政当局对外依附国际资本、对内强化集权统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兼具“软弱性”与“有害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国际金融霸权的依附者与分享者,恩古吉籍此指明了与之展开“抵抗”斗争的必要性。

二、革命的可能性:买办政权的“薄弱环节”与妮亚维拉的革命主体

我们要在此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如何为民众有组织的抵抗创造了可能性与前提这一问题。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709)。作为“绝对规律”,这个“薄弱环节”在冷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很可能存于受其间接控制的后殖民国家,并直接体现为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恩古吉似乎很少使用“薄弱环节”或类似字眼,但在其作品中不乏此类描写,尤其是统治阶级阵营内部的裂痕与倾轧。

《巫师》中,这首先表现为内阁部长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拆台。“邪恶排队事件”发生后,两位内阁部长在独裁者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希凯奥库(Sikiokuu)主张严禁民众排队集结,暗讽全球银行访问活动的组织者马乔卡利(Machokali)在其“政治袖管”中暗藏阴谋;后者针锋相对,认为排队是民众支持“通天塔”工程的表现,应予鼓励。其他阁员一概作壁上观,不问是非,只会倒向胜出者一边。²此外,“薄弱环节”也显现于独裁者与内阁部长之间。独裁者善于挑动部长间的明争暗斗,自己遂成各方争取与依靠的对象,但部长们对他也怀有二心。小说中希凯奥库的满腹欲望塞于“if”不能抒发,后在巫师引导下袒露了对最高权力的觊觎之心,“if”之意为:“如果”独裁者病了或死了,他就能取而代之。³“薄弱环节”甚至发生于统治者的家庭内部、至亲之间。小说中的独裁者一直通过特务组织M5暗中监视几个儿子。⁴而儿子们在“宫廷政变”后,为了换取新政权的赦免,居然都声明独裁者父亲确已“自行消失”(754)。最后,“薄弱环节”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代理人之间。小说中,

1 参见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26.

2 参见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159-164.

3 参见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414.

4 参见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262.

美国特使直白地向独裁者表达警告与威胁，要求他让位，独裁者虽承认美国或许能扶他上位，但不会任由美国赶自己下台。¹

需特别指出的是，上文指认的这些“薄弱环节”有赖于革命主体通过具体政治纲领以及对斗争形势的研判才能被识别甚至创造。因此，只有形成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并展开能够逆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革命实践，以上所谓本土买办政权固有的孱弱性及其内部的分裂与倾轧才能充分呈现，并转化为可资利用的“薄弱环节”。法农曾提到，少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尽管缺乏确定的政治思想，但本能地反感独立后争权夺利的现象，不信任那些投机分子；他因此强调，在将国家引入健康发展方向的决定性斗争中，要对这些知识分子善加利用。²《巫师》中，出身富商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妮亚维拉就是能识别与促成“薄弱环节”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故事开篇不久，塔吉里卡大谈前日晚上在天堂酒店欢迎全球银行访问团的活动被乞丐破坏的闹剧，断定这些乞丐是政敌派去的搅局者，并论定“我们见不得自己人成功”（102）；妮亚维拉此时准确识别了其中端倪，断定这是刺探消息的“绝佳时刻”（102）。此类对“薄弱环节”的指认与促成始终贯穿于妮亚维拉的革命实践。独裁者及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罔顾民生，推翻他们具有革命正当性。但是，目的正义与手段正义，二者不可分割³。展开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妮亚维拉难免面临诸多道德选择。道德选择是实现自我约束和抑制自我欲望，在理性引导下追求正确的选择结果。妮亚维拉坚持人道主义伦理，促成了有利于革命目标达成的“薄弱环节”，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维吉尼娅的转化。维吉尼娅遭受丈夫误解、冷遇与家暴，来到乌鸦巫师处讨要毒药谋害丈夫。人道主义思想让妮亚维拉“绝不会给她毒药，也不会扼杀她的希望”（481）。于是，她用“人民法庭”为其讨回公道。表面上，这是法外施暴，属于“蓄意伤人”，但如此才能保住塔吉里卡一命。从此角度看，妮亚维拉“革命有道”，不仅没有残害生命，而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又造成了维吉尼娅这一统治集团中的“薄弱环节”。妮亚维拉奉行的是一种严苛的政治伦理。作为革命队伍的领导者，她并未“足不履危地”（鲁迅 393），而是身先士卒，多次涉险，迥异于现实世界里只会躲在群众身后“指点江山”的革命者。

抵抗的可能性若要转化为抵抗运动的实践，抵抗的策略就尤为重要。随着冷战终结，第三世界作为两极格局中的国际政治运动似乎也随之终结，但恩古吉在小说中重新提示第三世界的存在，似乎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全球化的反动，也似乎提示我们作为政治运动的第三世界或许已沉寂，但作为思想资源的第三世界依然有效。在《巫师》中，明显可见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

1 参见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582-584.

2 参见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Richard Philcox,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121.

3 参见 林峥：“如何反抗——鲁迅〈铸剑〉的革命伦理思索与国民革命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2023）：123。

互动，不过恩古吉此处强调的是另一种世界主义，即将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引入后冷战时代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三、革命的策略：作为解放对象的“阿布拉利亚国”与作为思想资源的“第三世界”

恩古吉对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的认知，似乎未受历史终结论思潮的裹挟，反认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形式进入了最后疯狂时期。而在恩古吉看来，“斗争的剧场”依然是“第三世界”（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53），《巫师》中的阿国即体现了这一场域。在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后冷战时代，帝国主义通过“分化、削弱与瓦解抵抗”（21）策略，造成了昔日革命者纷纷倒戈变节，在此条件下非洲的抵抗运动该何去何从？

《巫师》中展开的抵抗图景与恩古吉之前的作品确有区别，体现于大量域外元素参与了小说情节的编织与开展，尤其是小说中反复明确指认的“第三世界”。可见，评论界注意到《巫师》的“世界主义”转向并非没有根据，但问题在于：所谓“世界主义”转向是否以否定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思虑为代价，还是与后者构成了某种内在关联与互动，这是解读此作的关键。如果说恩古吉早期小说中非洲本土与西方外来思想更多表现为冲突与紧张，那么在《巫师》中的确有所变化，即内外两种力量还表现为相互借力、彼此呼应的关系。进一步言，这些民族性资源与世界性资源能否进入小说中革命者的视野，完全取决于其成为抵抗实践的手段与力量的可能性。因此，对这些民族性与世界性资源的评判，并不取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二者本身孰优孰劣，而取决于能否为革命实践所用。

《巫师》呈现了阿国人对印度教育的负面认知，该国甚至有人妄言印度的学位可购于集市，卡米提为靖浮言，强调自己在印度求学期间收获丰硕，选修了草药学，对植物的根、叶、皮皆有研究。¹恩古吉引出如此偏门的异国之学，并非随意之举，看似与非洲革命抵抗运动无甚瓜葛的草药学在后文中成为助力革命之显学。小说最后，卡米提被带到了中弹后曾接受手术的医院，强调要根据个人修养的“七草药”（Seven Herbs of Grace）原则将此地建成健康与洁净生活的育儿所；“天赐七草药”旨在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禁忌、欲望节制、生命哲学等，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善，即平衡。此处的“平衡”乃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恶。对于森林等自然资源，阿布拉利亚国政府与美国、欧洲、日本大公司连同当地富人没有节制地滥砍滥伐，破坏了降雨的节奏，造成了土地荒漠化。²对此，小说所作总结——“他们懂得如何索取，但不知如何回馈土地”（201）——似反向阐明了“七草药”原则作为域外思想对于非洲本土革命实践的意义。恩古吉在小说中建立了源

1 参见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57.

2 参见 Ngugi wa Thiong’o,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201.

自印度的“草药学”与老子《道德经》中“道”（Tao, The Way）之间的联系。卡米提把自然之法推荐给妮亚维拉，即“简朴与平衡”，也就是“道”（266）。因此，无论印度“草药学”体现的“平衡”思想，还是中国老庄思想中“道”，皆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取”和“予”的和谐关系，都是对资产阶级原教旨主义对非洲的掠夺与破坏行径的否定，提示包括印度与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形成思想的共同体，成为可助益非洲革命运动的思想资源。

从有利于抵抗运动的眼光看，不仅作为某种外部性存在的第三世界可进入革命者的视野，而且原本被视为本土文化糟粕的部分也具有反转为革命力量的潜能。恩古吉早期作品中的巫术叙事都较为负面，无论殖民者输入的现代性观念中，还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中，都难有其地位可言。不过，《巫师》或许标志了恩古吉的某种认知转变，此作中的巫术不是法农所谓殖民主义把非洲文化归入的迷信，而是一种虔诚信念，在恩古吉这里进一步成了可资抵抗与革命的能动性资源。乌鸦巫师这一隐蔽身份屡次帮助两位主角（也是乌鸦巫师的化身）逃脱险境、刺探情报或动员民众。A.G.警官从镇压革命的敌对势力，转变为同情与支持革命的力量，巫师信仰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革命者妮亚维拉在认识到卡米提拥有“上帝赐予的占卜力量”（210）时，当即要求他用此天赋为人民服务、为抵抗运动服务。

人类文明三阶段理论由自然选择、伦理选择和科学选择组成，这三阶段承上启下，推动着历史发展。¹伦理选择阶段，即我们目前所处阶段，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中文语境里，伦理选择的术语表达两个概念：伦理选择阶段和伦理选择活动。在决定是否成为“乌鸦巫师”的过程中，卡米提就经历了一系列道德伦理选择活动。假扮乌鸦巫师吓走警官后，妮亚维拉希望他以此能力助力革命，但他只想远离政治，遂予以拒绝并遁入森林。之后，妮亚维拉找到他，再次邀请他加入组织，但再次遭拒。后来，妮亚维拉因革命行动暴露受伤，逃进森林后被卡米提所救。妮亚维拉向他询问革命之法，卡米提建议她回到首都并愿意陪她同行，而回到首都意味着卡米提需要重扮乌鸦巫师，即参与到革命活动中来。彼时，卡米提的决定或单纯出于保护心上人的思虑，但他亲眼见证了统治阶级一系列的无道行径，遂转念效仿妮亚维拉救民众于水火，哪怕身中枪伤也在所不惜。所有人都生活在伦理选择之中并通过伦理选择活动体现其存在，最终完成人生的整个伦理选择过程。卡米提所作一系列伦理选择活动即体现了他对个人本质的探索与实现，他对乌鸦巫师身份前后的态度转变根本取决于对革命态度的转变，这一转变源于其目睹人民深陷水火之中，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关怀，最终在革命过程中作出了伦理选择。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4.

结语：两种世界主义的对峙与非洲革命的伦理

“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是恩古吉对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基本认知，这一时代的非洲革命问题见于不同阵营作出的不同伦理选择，编织了革命进程。革命对象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进行伦理选择，激起民愤，造成了革命的必要性；革命者的伦理选择则在人民一方，维护人民利益，提示了革命的可能性。判断任何思想是否有效，恩古吉认为关键未必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Thiong'o, *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132）。恩古吉在全球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后仍提出非洲革命的问题，正是立足于“改变”。这种改变的基本对象依然是肯尼亚乃至非洲大陆，但面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全球化，单靠肯尼亚一国甚至非洲大陆自身似不足以实现这种改变，因此恩古吉在《巫师》重提“第三世界”这一彼时似已过时的概念，提出了亚非拉重新联合的思想。小说中存在两种世界主义的紧张与对峙，即代表被压迫者与革命者的第三世界与代表压迫者与革命对象的西方世界之间的对峙。因此，恩古吉于此作中彰显的，并非融入西方既定秩序的世界主义，而是与造成全球性压迫的秩序展开斗争的另类世界主义，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三世界主义。因此，这种世界主义与非洲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相互呼应、彼此借力。熟悉恩古吉文学写作与思想演进的读者可从《巫师》中看到恩古吉彼时思想的几重特征，大致可归纳为三个伦理选择：即从早期民族主义思想本位转向第三世界共同体的新论述、从传统的反（新）殖民主义话语转向抵制金融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新目标、从精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大众的新革命主体。需要说明的是，这三重伦理转变是一个渐变过程，而非骤变于《巫师》的创作过程，但我们或可提出，这几重伦理转向至《巫师》基本完成或更为成熟。

Works Cited

- Amin, Samir. et al.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 . *Spectres of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Current Intellectual Fashio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 Bayart, Jean-François and Stephen Ellis.. “Africa in the World: A History of Extraversion.” *African Affairs* 2 (2000): 217-267.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Richard Philcox.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Lenin, Vladimir Ilich. “On the Slogan for a United State of Europe”, edi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 2.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林峥：“如何反抗——鲁迅〈铸剑〉的革命伦理思索与国民革命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2023）：121-131。

[Lin Zheng. “How to Resist: Thoughts on Revolution Ethics and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3): 121-131.]

鲁迅：“致杨霁云”（1935年2月24日），《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Lu Xun. “To Yang Jiyun” (24 February 1935).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1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MacDonald and Ian P.. “The Cyboge Manifesto: Time, Utopia, and Globality in Ngũgĩ’s *Wizard of the Crow*.”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1 (2016): 57-75.

Mutunga, Willy. “Ngũgĩ wa Thiong’o at 80: Inspiring Encounters.” *Ngũgĩ: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of Writing*, edited by Simon Gikandi and Ndirangu Wachanga. Woodbridge, Suffolk: James Currey, 2018.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Thiong’o, Ngũgĩ wa. *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London: James Currey, Heinemann, 1993.

—. *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Art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Secure the Base: Making Africa Visible in the Globe*. New York: Seagull Books, 2016.

—. *Wizard of the Crow*.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